

◎ 市县政协建国后史料选辑之二

38

湖北文史资料

一九九二年第一辑(总第三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湖北文史资料

总第三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

湖北文史资料

一九九二年第一辑
(总第三十八辑)

市县政协建国后史料选辑之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B07/11

湖北文史资料

(季刊 1980年创刊)

1992年第1辑(总第38辑) 1992年8月出版

出版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刷者:湖北省计委印刷厂

发行者:《湖北文史资料》发行部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200千字 印数:6000册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67 定价:2.20元

目 录

襄阳农业跨大步·····	雷官森 高洪礼(1)
恩施地区农业生产方针的提出和发展的回顾·····	阮秀平(9)
武昌县农业体制的演变·····	汤立规(19)
农村经营管理回顾·····	张振民(29)
农产品成本核算试点工作回忆·····	张振民(40)
洪山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回顾·····	刘益德(44)
科技促使阳新农业生产前进·····	周宗璜(50)
玉米生产三上台阶·····	彭应国(57)
林海新颜·····	唐方正(67)
畜牧由副业到专业·····	郑国杰(74)
四十年来的阳新水产事业·····	章志勤 邓承华(83)
我在东西湖农场工作的五年·····	冀晨曦(89)
荆江分洪工程虎渡河截流记·····	郑定智(97)
回忆修建丹江口大坝的日日夜夜·····	李 峻(103)
洪湖儿女驯水记·····	吴道恺 郭兆玉(112)
“卧龙”降服洪水·····	刘玉平(118)
全省第一个拖拉机站·····	刘顺琦(123)
椒园的坡改梯·····	秦宗泽(130)
天下第一田与亩产三万六·····	郑重建(133)
襄阳财贸回顾	
·····	王润田 焦立安 王昌淮 朱振森 史光荣(136)
财政的发展与改革·····	鄢志来 张成林(148)

襄阳税务剪影·····	邓德友	宋贵生(156)
黄石金融事业所走过的道路·····		谭道达(162)
人民储蓄琐忆·····	杨培清	翁浩先(166)
农村信用社的发展·····	杨培清	翁浩先(170)
保险事业的变迁·····	郭学启 李祖民	胡东胜(176)
中南商业大楼的兴建与发展·····		钟 南(182)
粮油购销概述·····	蔡怀珠	王会涛(187)
漫谈生猪鲜蛋购销·····		曾旭东(195)
从洋油垄断到石油计划供应·····		谢本培(203)
供销合作商业发展纪实·····	张良一	余耀清(209)
前进中的洪山集贸市场·····	朱 波	徐之勇(221)
走工厂跑口岸发展对外经济贸易·····		郭崇喜(225)
工商行政管理述略·····		刘忠泽(232)
改革开放中的咸宁物价工作·····		阮世礼(239)
略谈咸宁物资工作·····	董宏武	陈中枝(243)
咸宁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概况·····	柯裕云	陆承剑(247)
石灰窑区劳动服务公司的兴起与发展·····		黄 志(250)

襄阳农业跨大步

雷官森 高清礼

40年来,襄阳县农业生产发生了历史性的发展变化。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逐步走上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道路。粮、棉、油等几个主要产量指标名列全省前茅。多次受到中央、省、市的表彰。回顾过去纵观现在,我县的农业生产是在风雨中发展,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前进的。

(一)

1949年到1952年,深受封建剥削压迫苦难深重的农民,经过党领导的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土改复查,有力地打击和削弱了农村的封建势力。广大农民焕发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生产积极性,他们在分得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忘我劳动,充分发挥传统农业的优势,夺得农业连年丰收。1952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3.136亿斤,比1949年的1.39亿斤,增长1.25倍;棉花总产达13.14万担,比1949年的6.54万担,增长1.01倍;油料总产达39.736万担,比1949年的18.58万担,增长1.14倍;农业总产值达8274万元,比1949年的6233万元,增长32.74%。

从1953年到1957年,全县农业经过恢复后,以稳健的步伐进入了合作化的兴旺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生产关系,还是劳动组织形式都发生了新的变革。为了发展生产,克服小农经济力量单薄,避免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我县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

中央发出的“组织起来，走发家致富的道路”的号召，开始组织互助组。全县第一个临时互助组是1952年春建立的伙牌部营村部金龙互助组。当时，这个互助组只有3户农民，11人，5个劳力，3头耕牛，犁3张，耙5盘，共有耕地56亩，经过一年的巩固工作，这个互助组又发展成为常年性互助组。县委及时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并在全县推广。同时，还派出大批工作人员下乡，帮助农民组织互助组 and 解决具体问题。1954年，全县除试办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外，常年互助组发展到7345个，季节性互助组5261个。参加互助组的农户达9321户，37424人，占全县农户的58.2%，农业人口的57.9%。

在互助组不断提高和巩固的基础上，1954年春，伙牌乡建立了全县第一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组织——襄郢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接着各区、乡都纷纷试办。1955年8月，全县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到年底，初级社已发展到366个。同时，还出现了6个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至1957年元月，全县高级社已发展到605个，入社农户达156727户，占全县总农户的97.4%，尚未入社的农户只有4222户。农业合作社的建立，使小农经济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全县的农业生产进入了兴旺发展的时期。与此同时，全县8个区都相继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农技站大力推广了以新良种为主的各项农业栽培技术，实行轮作换茬，推广合式秧田，搞好病虫害防治，广大农民在农技部门的具体指导下，开始精耕细作，从而实现了稳产高产。195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4.09亿斤，棉花总产19.45万担，油料总产30.53万担，比1949年油料增长64.31%，农业总产值达1.33亿元。粮食、棉花产量均增长1倍以上。

(二)

从 1957 年到 1966 年,我县同全国各地一样,开始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阶段,全县经过了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四清”运动,农业生产受到了 1959~1961 年 3 年困难时期的挫伤,呈“马鞍型”发展。

1956 年在全县基本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高级社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还没有来得及巩固,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了。1958 年 8 月末到 9 月上旬,全县相继建立了卫星社、火箭一社、火箭二社、燎原社、宇宙社、跃进社、五星社、红旗一社、红旗二社等 11 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达 157996 户,占全县总农户的 99%。共有 653676 人,277115 个劳力,耕地 2571246 亩。全县 10 天时间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与此同时,原来的 557 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改为生产大队,下辖 3424 个生产队。人民公社实行的是公社所有制,取消了原来的高级社的集体所有制。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上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统一经营,搞“一大二公”,其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化。同时,对部分家庭副业和生活资料也实行公有。无论是土地、耕牛、农具、还是劳力、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等都由公社统一支配。在劳动组织等形式上提出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人民公社的劳动组织普遍实行团、营、连、排、班的建制。劳动没有定额,干活不计工分。当时,全县共建 15 个团(基本上是一社一团),230 个营,840 个连,3401 个排,10529 个班。在劳动形式上,搞“大兵团作战”,提倡“行动战斗化”,社内的劳力统一调配,统一使用。在生活和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全县各人民公社迅速建立了集体食堂,所有的干部群众,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同时,每个劳力每月发工资 2—3 元,即所谓的“吃饭不要钱,按月拿工资”。于是,全县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从县到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层层

都搞“一平二调”，无偿地平调土地、房屋、劳力、耕牛、农具、粮食和资金等。随着“共产风”的持续发展，使人民公社取消了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导致高级社时已经出现的“一刀切”等左的思想愈演愈烈。在“共产风”出现的同时，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特殊化风相继出现。在农业生产上，“高产卫星”遍及全县，什么“亩产万斤粮”、“卫星田”、“天下第一田”的牌子到处可见。不少地方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违反科学的口号。有的地方为了夺取高产，组织“兵团”作战，大搞深翻和密植，有的甚至提出“深翻七尺，亩产万斤”，有的把十几亩水稻在稻谷散籽时，移到一个田里创“高产”，有的小麦播种量每亩竟达1000斤等等，由于上述这五股风（以后简称“五风”）的干扰，使左倾错误严重蔓延，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1959年全县天灾人祸交织，农业生产急剧下降，这一年全县遭遇建国后第二个大旱之年，受旱面积达176855亩，粮食减产2.43亿斤，棉花减产15.01万担，油料减产11.61万担。

1960年冬，我县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也叫反“五风”），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几次调整。1961年我县将原来的“大公社”改为区，管理区改为“小公社”。同时，将原来的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体制——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并开始恢复了高级社时期行之有效的一些经营管理制度，较好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农业生产也相应得到恢复和发展。1962年全县粮食生产走出低谷后呈上升趋势。

1963~1965年我县又相继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使广大农民群众进一步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激发了社会主义热情，农业生产持续发展。1965年全县农业获得建国后最大的丰

收年景。粮食总产量上升到 5.22 亿斤,棉花总产量达到 16.44 万担,油料产量达到 73.8 万担,农业总产值达到 1.39 亿元,整个农村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三)

从 1966 年到 1976 年,我县同全国各地一样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 10 年中随着运动的发展,“左”的错误继续蔓延。在农业生产分配上提出了向大队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转变的“穷过渡”。取消社员的家庭副业,自留地和集贸市场的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受到破坏。到 70 年代初期,全县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热潮,提出了“学大寨,超纲要(纲要规定亩产粮食 800 斤)、过长江”的口号。全县先后组织千名基层干部到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于是,一个学大寨、赶大寨,大寨红花遍地开的群众运动在全县蓬勃兴起,各地都以大寨大队为榜样大搞治土改田,兴修水利,推广一些先进的技术措施,并积极推行大寨的记工方法。在这一时期内,全县农村普遍按照大寨发展生产办法开始批判“三自一包”、“工分挂帅”和“物质刺激”,即所谓的“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当时,全县 643 个生产大队都按照大寨的模式,由生产队核算改为大队核算,同时在种植方式上,也仿照大寨大队,大搞“两杂”生产,即杂交苞谷,杂交高粱。70 年代初,全县杂交苞谷种植面积达 20 多万亩,杂交高粱种植面积达 10 多万亩。开始走“水路不通,走旱路”发展农业生产的路子。

全县农村在农业学大寨的过程中,根据“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积极扩大粮食作物面积,缩小经济作物面积,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的局面。这一阶段,全县科学种田活动也有较大发展,在学习外地经验的基础上,相继建立了县、区、乡、村四级农科网。在全县大范围内推广了劣种改良种、高秆改矮秆,稀植改合理密植,单季改双季,旱改水,大力发展绿肥,实行用

地养地相结合以及在红薯和苞谷生产上实行间作套种等各种技术措施。不少地方推广地下埋“炸弹”(红薯),地上放火箭(苞谷)的高矮间作方式。全县水稻种植面积,从1974年后,不断扩大,最高达到80多万亩。其中双季稻从无到有发展到15万亩。冬季绿肥扩大到50多万亩,大部分水田为一季稻。当时群众反映说:“一季绿肥,一季稻,舒舒服服上纲要”。普遍对在襄阳违背客观条件种双季稻的作法持消极态度。在“收不到稻谷收稻草”的“左”倾思想干预下,双季稻在我县经过几年的周折后还是自行消失了。从1976年开始,全县又推广了杂交水稻,平均亩产800多斤,比常规稻增产30%以上。为此,全县先后五次出动240多人次到海南岛繁殖种子。由于杂交稻增产潜力大,因而一推而广,深受群众欢迎。到70年代中期,全县先后推广了宜宾一号、7023、鄂麦六号等小麦新良种和鄂光棉以及芝麻的中芝五号、中芝七号等。在这一时期,全县农业生产进行了三次大的变革。即高秆改矮秆,一季改两季,改耕作粗放为精耕细作。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使农业生产保持了稳步发展的势头。1976年全县粮食总产达8.37亿斤,比1957年增长1.04倍;棉花总产31.07万担,比1957年增长59.74%;芝麻总产16.65万担,比1957年减产57.8%。

(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农业生产进入了历史性的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在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普遍推行了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全县广大农民以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指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勤劳致富,奋勇前进。农业生产一年有个新变化。

1980年全县干部群众从实际出发,先后建立了“小段包工,定

额计酬”和“包工包产，联产计酬”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81年开始推行以包产到户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到1982年，全县4467个生产队，有4446个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的生产责任制，占全县总队数的99.53%。1983年春，全县各生产队全部推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生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生产力得充分发挥，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自1985年开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大繁荣了城乡经济和市场，不仅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而且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全县整个国民经济呈现出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就粮食生产而言，自1980年以来，全县每年递增1亿多斤，其他作物的产量也都快速发展。1988年夏秋，全县遭受100多天的旱灾，秋作物普遍干枯，由于全县人民认真贯彻落实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的方针，奋力抗灾，使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1989年全县人民积极响应县委提出的“一年受灾，一年恢复”的号召，把改革开放焕发出来的积极性，用于大干社会主义，使科技兴农之花开遍全县各地，农业生产继续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全县人民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过程中，迅速掀起了靠科技致富的热潮，积极开展科技兴农活动。在这一时期内，全县农村重点抓了以常规措施为基础，以模式栽培为主体，以推广各种高新技术为突破口的各项技术措施。归纳起来，主要有5个方面，10大内容，40多个科技项目。即“两杂”（杂交水稻，杂交苞谷），“两膜”（地膜棉、地膜菜），“两肥”（配方施肥，推广微肥），“两化”（化学除草，化学调控），“两优”（优化模式栽培，优化产业结构）。如杂交稻种植面积由1980年的4.56万亩到1991年发展到84.7万亩。由于大力推广了这一新技术，使全县水稻亩产由1980年的514斤提高1991年的1254斤；配方施肥由1980年的28万亩增长到1991年的260万亩；化学除草1980年

开始试验,1991年猛增长到182万亩;化学调控从1983年开始,全县只有0.3万亩,1991年发展到151.42万亩;优化模式栽培全县由点到面、由少到多,1991年扩大到210万亩;两膜棉1983年全县只有169亩,1991年发展到28.6万亩等等。由于全面推广了这些高新技术项目,大大提高了科技投入效益和经济效益,使全县农业生产持续发展。1991年全县粮食总产达21.1亿斤,名列全省县级之冠,跨入了全国百强县之列,占全国县级第22位。棉花总产达41.6万担,占全国县级第99位。油料总产达70.2万担,名列全省县级前茅,占全国县级第88位。农业总产值达6.50亿元,占全国县级第31位。1990年以来,全县先后荣获农业部颁发的粮食创高产活动奖和农业部、商业部颁发的全国棉花生产先进县奖以及农业部颁发的芝麻生产科技成果二等奖。

恩施地区农业生产方针的 提出和发展的回顾

阮季平

解放前,山区的农业生产,没有什么方针指导。农民按照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原则,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可能,能种什么就种什么,想怎样搭配就怎样搭配,各搞各的,互不相干。这样虽说比较实际,比较灵活,但农业生产发展缓慢,且盲目性大,风险性也大,或遭受灾害袭击,就会造成很大损失,所以山区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

解放后,农业生产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把它当成头等大事来抓。特别是土地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广大农民并不完全满足于新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相适应的状况,还迫切要求在生产结构上要有新的组合,以充分发挥山区的自然优势,加速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就很自然的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用什么样的方针来指导农业生产。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恩施地委于1955年秋季提出了“力争粮食自给有余,大力发展多种经济”的生产方针。

这个方针一提出,就得到广大农民群众、各级干部的拥护和欢迎。根据我在恩施工作十多年的体会,只要认真地正确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时间越长,效果就越好、越显著,越能显示出它的生命力。从1956年到1966年这11年间,也是我在地委领导下,与恩施

地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一道共同实践这条方针的头 11 年。这 11 年间,有 3 年遭到自然灾害的袭击和连续几年“五风”的错误干扰,但全区粮食总产量仍从 111400 万斤,提高到 141200 万斤,年递增率为 2.4%。看来这个速度并不理想,但 1960 年在特大自然灾害袭击下,全区粮食减为 84000 万斤,在 3~5 年内恢复和发展到 14 亿多,速度是不算慢的。在这 11 年内,只有 1957 年和 1959 年两年恩施地区吃了省的调进粮食共 3530 万斤,其余时间,年年都往省里上交粮。总共上交 16013 万斤,年均上交 1326 万斤。当然,这个时期还有不少区、乡还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但从总体上看全区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并略有节余。这对困难重重的大山区来说是不简单的。当然恩施地区农业生产水平发展的高低,不能用向省上交粮食多少来衡量,而要进行全面考察,更重要的是在多种经济上要形成优势、形成拳头,变自然优势为商品经济优势。但上述情况说明恩施地区不仅应该,而且也有条件立足本地 450 多万亩耕地,解决全区 300 多万人民的吃饭问题,这个前提和基础不解决,山区的多种经济也是难以发展的。在这 11 年的时间内,恩施地区的多种经济,尽管遭受到折腾,但也得到相当规模的发展。在我的记忆里,恩施地区在经历了 3 年自然灾害损失后,在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导下,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全区农村经济即得到迅速恢复,各项农副产品产量出现全面增长势头。这期间,年均农业总产值回升到 44963 万元,1966 年比 1962 年增加 93901 万元,年递增为 7.20%,其中林业、牧业、渔业年平递增率,分别为 6.76%、5.38%、5.64%。油料产量年均 952.0 万斤,1966 年比 1962 年增加 606.0 万斤,年平递增 18.42%,肥猪年平出栏 59.21 万头,1966 年比 1962 年增加 25.95 万头,年平递增 15.41%。这些都说明粮食发展了,多种经济也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

历史已过去了 30 多年,回顾在 50 年代初,为什么要确立、后来又怎么发展“力争粮食自给有余,大力发展多种经济”这个生产

方针呢？根据我个人的体会与经验，当时地委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脚踏实地，遵循客观规律

一个经济区域的生产方针，主要是根据其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来确定。恩施地区为什么要确定“力争粮食自给有余，大力发展多种经济”这样一个生产方针呢？就是因为恩施是大山区，过去有人说恩施是“天无3日晴，地无3尺平，人无3分银，”这个说法显然太夸大了，但是恩施山区的确很困难。它位于武陵山余脉和大巴山边缘之间，总面积24460.2平方公里，折合3594.15万亩，低山地区占23%，二高山占41%，老高山占36%，其中耕地面积只441.15万亩，构成“八山半水分半田”的格局。这里属于亚热带气候，终年温暖湿润，冬季无严寒，夏季少酷暑，雾多，湿度大，年平均雨量1550毫米，海拔高低落差大，气候垂直变化明显，最高峰3005米，最低谷只66.8米。全区山林面积约2353万亩，尤适于针叶林和阔叶林生长。全区有乔、灌木树种1000多种，其中经济价值较大的约有300余种，特产资源丰富，主要柑桔、茶叶、黄连、生漆、党参、桐油、桑蚕、苧麻、棕片等10多个传统品种。长江两岸、清江、酉水及澧水等流域为柑桔生产提供了天然生长条件。鄂西又是中药材主要产地之一，被誉为“华中药库”，药用植物有168科、854属、2068种。还有辽阔的山场、草场，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巨大资源。地下矿产资源也很丰富，蕴藏有大量硫磺、铁、煤和其他非金属矿产。这些自然条件，既适宜发展粮食生产，又适合多种经营。历史上，山区人民利用这些条件为自己的生存、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少不利条件。山大坡陡，交通不便，气温低、日照少、旱涝病虫害频繁，外加一些社会因素，如文化教育落后，劳动力的文化素质低下，这些都严重制约着山区农业生产的发展。1949年全区粮食总产7.91亿斤，人均

占有只 419 斤、单产才 153 斤。长期以来,山区人民有一个共同的最低标准的愿望,就是要求搞个“壮儿圆”,一年四季都有饭吃。恩施地区第一任专员周敬学同志对这点体会尤深,他多次说:“在恩施地区工作,就是要首先解决全区人民吃饱饭。共产党员没有这个本事,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呢?”又说:“江汉平原是产粮区,但我们不能靠省里给调粮食过日子,粮食是坐不起汽车的,如果是那样,我们山区只会越搞越穷。”同时,周敬学同志也要求大力发展多种经济,特别是要重视林业发展,要抓住骨干传统产品的生产发展。他逢会必讲,并多次提醒我们:各级干部要在社会改革的同时,着眼于今后山区的长远发展。50 年代初,我在咸丰县工作,对此也深有体会,认识到粮食问题,确实是山区发展生产的一大障碍,尤其是高寒山区粮食问题更突出。春荒刚渡过,五六月夏荒又来了,一年到头愁粮愁吃。当然有的地方虽有粮吃,但没有钱用,无钱购买农具,无钱交学费,无钱买灯油,当时有人说,这真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吃。这就是山区特点,也是确立山区生产方针的客观依据。

第二、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经验

土地改革完成,农村工作转入以生产为中心之后,各地相继都在探索山区生产发展的路子,并提出过不同的口号与要求。如我在咸丰工作时,1953 年初,县委责成县政府建设科长范英、张义卿等同志草拟第一个 5 年生产发展计划,提出了“争取粮食自给,大力发展桐、漆、茶、麻、桔等土特产”,并要求 5 年以后全县 80% 以上农户有饭吃,有衣穿。当时虽然还没有将它作为生产方针提出,但这个指导思想已经开始形成。

1954 年夏,恩施全区办起了 20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试点,地委要求一定要把这批社的生产搞上去,发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确实起到示范作用。这年夏天,由地委副书记霍震主持召开了 20 个试点社座谈会,大家反映富裕中农的生产好、生活好,合作